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抗战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云南北西干部学院 邹 林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重要的国际连接枢纽,承载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区的抗战工作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组织优势与战略远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保卫国际通道及动员边疆各族人民投身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在云南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消息传到云南,中共云南临时工委立即组织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各大中学校师生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并开展请愿活动。为了更好地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成立并领导了“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秘密组织。

与此同时,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在学校、工厂以及全省各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共发展党员50多名,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不断壮大抗日救亡队伍。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昆明支部领导“学分会”发起纪念活动,吸引云南各界群众3万多人参加。活动中,群众高呼“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进一步唤醒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自觉,在全省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极大地激发了各族群众爱国主义热情。

此时的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汇聚了众多民族力量。随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成立,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民主爱国人士聚集云

南,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救亡的进步力量。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的学生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记载,先后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党员学生达206人。即便敌机在头顶盘旋,讲台上的教授依然镇定自若,坚守讲台,守护着民族的希望。

1938年上半年,为解决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与中共昆明支部在工作上的重复和交叉问题,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将两个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便将“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和西南联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后简称“民先”),统一领导云南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民先”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扩展到全省各县和农村。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云南省工委。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云南省工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推动云南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文艺界、新闻界十分活跃,《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公开刊物《南方》等广泛宣传团结抗日,传播先进文化;《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的上演,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抗战后期,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怒江以西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数十万云南同胞惨遭屠戮。随着滇缅公路等重要通道被切断,全国抗战战略全局面临严重威胁。云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如果日军深入云南,就要在云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积极组建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党员朱家璧、张子斋的引导下,龙陵青年朱嘉锡组建了龙路抗日游击队。这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成立的游击队,经过朱家

璧的训练与领导,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41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中共党员江枕石进入云南,动员当地爱国士绅罗正明组建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佤山抗日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到800余人,并主动对日军发动攻击。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云南先后组建了10多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达5000余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勇作战,有效扰乱和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与此同时,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动员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义务劳动、物资募集,努力完成军工生产和军事运输任务,为滇西大反攻提供了有力支援,在云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号召,并向各地党组织作出了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然而,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此背景下,龙云主政下的云南成为维系这一战略局面稳定的关键地区。面对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抗日立场,积极构建并维护云南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朱德等高度重视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将其视为影响抗战全局的关键。1937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同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朱德、叶剑英向龙云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得到了龙云的赞同。此后,中共中央又派遣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继续与龙云接触,向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朱德还亲自致信龙

云,积极推动云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沟通,龙云的政治态度从最初的疑虑戒备,转变为默许乃至有限度地支持中共在云南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做龙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广泛团结云南各界人士,共同推进抗战事业。1940年,朱德、吴玉章以师生、朋友的关系致信国民党元老、重九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李根源,恳请他凭借自身威望,策动有关军队并动员民众抗击日军。在罗炳辉的促成下,滇军60军第184师师长张冲同周恩来、叶剑英会面。张冲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希望党组织派人进入其部队工作。随后,党组织派遣周时英等共产党员进入滇军第184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在党的思想引领下,广大滇军爱国将士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38年4月,滇军60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全军参战人员3.5万余人,伤亡18400多人,伤亡率达52.4%。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政治诱胁下,汪精卫集团与其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3份卖国文件,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谴责。为巩固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云南省工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提出了“讨汪”政治口号,要求政府明令开除汪精卫国籍,以汉奸卖国罪通缉,并彻底清除其残余势力,以巩固团结统一抗日战线。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积极倡导以及云南各界“讨汪”运动的影响下,龙云于1939年2月10日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工作和团结引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逐渐形成并得到巩固。这个时期的云南吸引了大批民主进步人士聚集于此。这不仅为全国抗日民主事业开创了新局面,也为后续的军事斗争和抗战通道保障奠定了重要的

政治和社会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抗战中的时代价值

在云南抗战的艰苦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诸多宝贵的精神品质所秉持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云南民众的爱国热情,使全民族抗战的信念深入人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在云南的生动实践。

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超凡的思想引领和灵活的策略运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怀和战斗意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引领下,以罗炳辉、聂耳、周保中、朱家璧等为代表的云南儿女奋勇向前,为挽救民族危亡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党号召广大党员和民众发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即便在艰苦环境下,也要坚持抗争,并通过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鼓舞军民士气。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凝聚滇军等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敌。

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在云南抗战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中国远征军奋战在滇西峡谷密林,云南许多男女老少自发组成担架队、支前队,以向死而生的勇敢穿梭于前线与后方。在缺乏现代机械化设备的艰苦条件下,广大人民昼夜轮番苦战,依靠手挖肩挑,修筑了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等被西方人视为“世界奇迹”的工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抗战中铸就的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生动写照,引领云南抗战走向胜利,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坚定守护和平、勇于开创未来的信念与担当。

罗炳辉在“八办”的重要贡献

中共昭通市委党校 杨升华

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抗日名将,罗炳辉声名远扬,在抗日战争中“立功尤著”。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罗炳辉前往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公开身份参加“八办”工作,担任滇军统战工作组组长和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本文重点介绍他在对滇军60军开展统战、恢复中共云南省工委和输送抗日干部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激励读者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现代化昭通建设贡献力量。

抗日滇军的知心朋友

1938年元旦,滇军60军抵达武昌,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展示了这支来自云南边疆的抗日部队的雄姿,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高度赞扬。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对这支抗日部队高度重视,决定与其建立统战关系,共同团结抗日。受党委委派,时任武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中共党员黄洛峰与罗炳辉取得联系,他们首先接触了任184师政治部主任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永和(致中)。张永和介绍了云南地方领导人和滇军60军的抗战态度,指出龙云、卢汉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路线,龙云在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派滇军60军出征的决心十分坚定。同时,他还介绍了滇军60军中几位师长的情况,认为张冲的抗战态度最为坚决。经共同分析,大家认为张冲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决定首先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

张冲是云南泸西县人,时任滇军60军副军长兼184师师长。张永和原是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因组织遭受破坏被捕入狱,后经张冲保释出狱。国共二次合作期间,张冲邀请他到自己的部队工作,经组织同意,张永和遂前往担任政治工作。张永和将此前与罗炳辉、黄洛峰商讨的内容告知张冲,张冲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原本就希望张永和去联络中共方面,没想到共产党主动关心。春节期间,罗炳辉身着便装,与黄洛峰一同前往张冲的师部驻地,张永和陪同。双方开诚布公、畅谈滇军的光荣传统,表达共同抗日的意愿。罗炳辉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

势,阐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每一位热血男儿、每一位军人,都应思考自己肩负的责任。张冲点头称是,十分认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也表达了自己及所率领部队坚决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滇军60军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休整期间,罗炳辉又多次前往张冲驻地,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并把张冲推荐给周恩来,以及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他们向张冲详细阐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张冲深受感动。

张冲因病人住汉口万国医院期间,黄洛峰陪同叶剑英、罗炳辉前往看望,给予慰问和鼓励。张冲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率部参加八路军的愿望。叶、罗对他的进步要求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请示后予以回复。罗炳辉随后撰写报告,经长江局转报中共中央。此后,中共中央陆续派遣多名党员干部到184师工作,成立秘密党支部,在部队中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为鼓舞抗战士气作出了重要贡献。罗炳辉还向张冲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其入党及参加八路军请求的回复:考虑到国共合作大局和共同抗日目标,张冲保持现有职务和部队更有利于抗战事业,暂不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中共中央对他追求进步的意愿表示欢迎,并相信他的理想终将实现。

后来张冲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长成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始终铭记罗炳辉的引导之情。1979年6月,张冲病重住院期间,黄洛峰和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先后前往看望。他感慨万分地对罗镇涛说:“1946年听到你父亲在前线逝世的消息时,我万分悲痛。今年我80岁了,能有今天的荣誉,全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也要感谢你的父亲。我始终忘不了,炳辉将军是我革命的引路人。”

罗炳辉还多次前往孝感拜访卢汉,双方在团结抗战方面达成共识。罗炳辉还与潘朔端、曾泽生、安恩溥等滇军60军的中坚力量广泛接触交流,赞扬“滇军将士真可爱,一个个年轻结实、精神饱满,继承了滇军的光荣传统”。

1938年,在台儿庄会战中,滇军60军英勇作战。张冲指挥的184师坚守禹

王山近20天,阻击战尤为惊心动魄。尽管敌人不断增兵增补给,滇军60军却越战越勇,双方伤亡惨重,战况激烈。据统计,此役中仅昭通籍牺牲的将士就有3000多人。滇军60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重创日军,有力打击了其嚣张气焰,打出了滇军的威名,并缴获了大量装备,成功粉碎了敌人企图渡过运河占领徐州的计划。

日军持续增兵,滇军60军突破敌人重重的包围后,于6月上旬抵达武汉进行休整。部队缩编后统一归张冲指挥,安恩溥等人则返回云南招募新兵。休整期间,罗炳辉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委派,前往慰问滇军60军将士。他看望了卢汉、张冲,并亲切慰问了英勇抗敌的183师1081团团长潘朔端等伤病员。罗炳辉对他们说:“祝贺大家为抗战立功,光荣负伤后要好好疗养,痊愈后继续奔赴抗日战场。我们的一枪一弹都要用来消灭侵略者。”伤员们深受感动。此后,云南重新组建第30兵团,由卢汉任司令,下辖60军、58军和新3军。张冲晋升为新3军军长,参加武汉保卫战。

1939年9月初,罗炳辉与夫人张明秀收到彝良邮政局局长温国桢先生的来信,信中告知其父罗守清不幸病逝的消息,并提及猫描山罗家资助其子罗代勋读书之事。在9月4日的回信中,罗炳辉表达了丧父的悲痛,也对罗家资助代勋读书表示感谢,但他并未直接与罗家通信,推测是在武汉与滇军将领交往后,“大约是卢(汉)或安(恩溥)托付的”。

1946年5月底,潘朔端等人率领184师于海城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中最早起义的一支队伍。罗炳辉闻讯后,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此后,曾泽生率部于长春起义,卢汉也率部于云南起义。这些重大转变,凝聚着罗炳辉早年开展统战工作的心血。

罗炳辉在武汉的另一重要统战对象,是云南同乡赵定昌。赵定昌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与罗炳辉相识。1937年,他担任中原陆军第33师师长,奉命驻守武汉。因有旧谊,加之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当时寄养在赵部军需官李岳嵩家中,二人交往更为密切。虽各为其主,但两人抱有共同的志向——将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赵

定昌对罗炳辉评价甚高,认为他襟怀坦白、忠厚诚实,做事认真负责,勇敢顽强,忠于职守,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抗日意志坚决。赵定昌曾表示:“我尊重他的言行,从内心深处敬佩他的人品。受他的感染,我也忠于职守,努力做好警卫武汉的工作。”

云南地下党的牵线搭桥人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批特务进入云南,军警特一体,对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捕杀,赵琴仙、李鑫、陈组武等负责人相继牺牲。

1930年更是黑云压城、血雨腥风的一年。中共云南省委及其下属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刘平楷、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张肪等核心领导人壮烈牺牲,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幸存的党员只能隐蔽潜伏,等待时机。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才逐步恢复,一些隐蔽的同志辗转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八路军办事处寻求组织联系。由于同乡之谊,罗炳辉成为他们寻找和联络党组织的主要对象。

193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李立贤前往武汉寻找上级组织。通过黄洛峰的协助,李立贤找到了罗炳辉,随后经“八办”招生委员会介绍,李立贤前往延安,与中央组织部顺利接上关系。盐津县人马逸飞也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受到罗炳辉的热情接待。在听取汇报后,罗炳辉充分肯定了马逸飞不远千里追寻党组织的积极态度,同时提醒他做好接受党组织审查的思想准备,并建议他前往张冲部队寻找党支部。经过知情者的证实和组织的调查,马逸飞最终接上了组织关系,十分感激罗炳辉的真诚关怀。

后来,马逸飞担任184师参谋长,积极支持并参与组织领导了潘朔端在东北海城的起义工作。朱家璧、何宪龙等人也通过党组织找到罗炳辉,经其介绍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学习。学成返滇后,他们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中,朱家璧曾担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负责人之一。

大关县人张元元,原名张成凯。1931年在昭通城读中学时加入共青团,

1934年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后经李健秋和陈方(张体元小学时的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受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陈方、刘林元、张体元以及张子斋、范义田等人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陈方与张体元首先找到罗炳辉。罗炳辉看了介绍信,得知两人是大关县人后,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还是老乡呢!”革命情谊与同乡之情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罗炳辉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从云南远道而来,十分辛苦。现在各省去延安的人很多,云南地处偏远,去的人相对较少,你们应当多联系一些同志前往,通过抗大的培训,各方面能力都会得到提升。我也进过抗大,对此深有体会。多为云南培养干部,将来回滇开展革命和抗日工作就有本钱。云南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但现在搞革命很不容易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持龙云、卢汉抗战,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二人频频点头,十分赞同罗炳辉铿锵有力的讲述。

谈到团结抗战,罗炳辉以彝良猫描山罗家为例:“那是一家大地主,我家曾是罗家的佃户。听说罗泽钧要与我们认本家,还说要扶持我儿子读书。虽然我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但现在是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期,只要赞成抗日,我们就欢迎,既往不咎。他愿意送我儿子读书,我是诚心感谢的。家门就家门嘛,哈哈哈哈哈。”

经过在抗大几个月的学习,陈方等人返回云南,分别担任了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张体元后来脱党),为云南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

爱国青年投身抗战的良师

来自云南祥云县的左仲平当时是一名17岁的学生。他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后,毅然离家前往武汉,找到罗炳辉报名参军抗日。罗炳辉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得知左仲平是滇军老战友左又新之子,又见他参军心切、不辞数千里奔波来到武汉,罗炳辉深受感动,亲自写下介绍信,推荐他前往新四军第4支队聂鹤亭部。左仲平后来成长为了解放军某军副政委。

同为革命遗孤的余平原,持罗炳辉的介绍信前往延安后也进步很快,于20世纪70年代末担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武汉工作的10个月里,罗炳辉多次代表“八办”参加各类抗日社会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树立了良好形象。